



金融信息采编

COMPILATION OF FINANCIAL NEWS

2018年第70 总第644期

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 金融研究所

咨询电话：0551—63753813

服务邮箱：xtresearch@xtkg.com

公司网站：http://www.xtkg.com/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政务区

祁门路1688号兴泰金融广场2206室

2018年09月21日 星期五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

兴泰季微博、微信公众号



宏观经济	2
深改委：加强金融监管的集中统一 形成监管合力	2
李克强：3年后会有外国企业获得中国金融业全牌照全股比经营资格	2
国务院发文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2
四部门回应“社保税征”：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	2
经合组织（OECD）下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3
监管动态	3
证监会严禁债券超低价承销及向投资者返费行为	3
货币市场	3
央行开展700亿元逆回购操作	3
巴西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年内或难加息	4
金融行业	5
《信托公司受托责任尽职指引》发布 打破刚兑有了制度基础	5
互金协会公布首批银行存管白名单	5
香港机构港股投顾业务备案启动	5
国资国企	5
深化国企改革 河南已完成“僵尸企业”处置1109户	6
热门企业	6
蚂蚁金服再投10亿做大小程序	6
阿里获杭州市首张无人驾驶路测牌照	6
投资聚焦	6
中登：新修订业务指南不涉及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投资范围调整	6
余额宝平均收益连续跌破3%	7
地方创新	8
地方专项债发行“快马加鞭”一个半月发行超6000亿元	8
合肥居民可通过手机进行城乡居民医保缴费	8
深度分析	9
波澜壮阔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	9

宏观经济

深改委：加强金融监管的集中统一 形成监管合力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9 月 20 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强调，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对于弥补金融监管短板，引导大型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要明确政策导向，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监管、处置作出制度性安排，加强金融监管的集中统一、协调配合，形成监管合力，有效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李克强：3 年后会有外国企业获得中国金融业全牌照全股比经营资格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20 日在回答出席 2018 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中外企业家代表提问时表示，我相信 3 年后会有符合条件的外国企业，获得中国金融业全牌照全股比经营资格。他指出金融服务业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其开放程度与一国发展阶段、监管能力密切相关。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保持金融稳定不仅对自己而且对世界都是必要的。因此我们下决心既要继续开放金融服务业，又要保持有序推进。

国务院发文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国务院发文要求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以供给提升创造消费新增长点的循环动力持续增强，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居民消费率稳步提升。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加快推进住房租赁立法；鼓励和引导农村居民增加交通通信、文化娱乐、汽车等消费；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鼓励和引导居民扩大信息消费；深化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支持邮轮、游艇、通用航空等消费大众化发展；抓紧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四部门回应“社保税征”：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

9 月 19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医疗保障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就社会保险费用征收体制改革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相关负责人表示，

改革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对于一些企业担心实行税务征收增加企业负担的问题,相关负责人回应表示,当前各地征收体制改革工作正处于准备阶段,社保经办机构和税务部门着力于做好衔接工作,积极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并在改革工作中坚持只变更征收主体,原有政策继续保持不变的基本原则。

经合组织(OECD)下调明年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9月20日在巴黎发布全球经济中期展望报告,下调了明年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报告指出,受部分新兴经济体遭遇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或已见顶,下行风险增加,预计明年两年全球经济均增长3.7%,G20集团分别增长3.9%和3.8%,美国增长2.9%和2.7%,欧元区增长2%和1.9%,中国增长6.7%和6.4%,土耳其增长3.2%和0.5%,阿根廷增长-1.9%和0.1%。

监管动态

证监会严禁债券超低价承销及向投资者返费行为

证监会网站18日在“公司债券日常监管问答”栏目中就有关债券承销乱象的两个问题进行了回答。首先,对于交易所债券市场个别承销机构承销费率远低于正常费率的情况,证监会将继续完善发行监管制度,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引导和督促承销机构公平诚信、尽职履责地开展业务。另外,对于“发行人和承销机构是否可以向投资者返费”的问题,证监会表示,发行人和承销机构向投资者返费属严格禁止的行为,相关规定明确,应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货币市场

央行开展700亿元逆回购操作

中国人民银行9月20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在公开市场开展了700亿元逆回购操作,其中,400亿元逆回购期限为7天,中标利率为2.55%;另外300亿元逆回购期限为14天,中标利率为2.70%。当日另有1000亿元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资金300亿



元。9月20日, 银行间市场利率涨跌不一: 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显示, 隔夜利率为2.5190%, 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4.3个基点; 7天回购利率下跌0.9个基点, 14天回购利率上涨1.4个基点; 一年期利率为3.5120%, 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行0.1个基点。

巴西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年内或难加息

本周三, 巴西央行在9月议息会议中将利率维持在6.5%不变。这是巴西央行连续第4次将利率维持在6.5%的历史低位。2016年10月至今年3月, 巴西央行曾“大刀阔斧”连续12次降息, 将利率从14.25%下调至6.5%。巴西央行在9月份议息声明中表示: “下一步, 货币政策的实施将继续取决于经济活动的演变、风险的平衡以及通胀预期。”



金融行业

《信托公司受托责任尽职指引》发布 打破刚兑有了制度基础

备受信托业关注的《信托公司受托责任尽职指引》(下称《指引》)19日正式发布。作为信托业首次推出的规范信托公司履行受托人职责的具体办法,《指引》对信托公司的尽职调查、投资者适当性等问题均作出了规定,旨在明确信托公司开展信托业务的受托责任、尽职要求,达到约束受托人和委托人“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目的。业内人士称,《指引》的主旨与资管新规一脉相承,不仅强化了受托责任,而且有助于打破刚兑。

互金协会公布首批银行存管白名单

9月20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在“全国互联网金融登记披露服务平台”公布了北京银行等25家银行分别发布的“关于个体网络借贷资金存管系统通过测评声明”,首批通过中国互金协会测评的存管银行名单正式被披露。这25家通过协会测评的存管银行分别是:北京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廊坊银行、新网银行、武汉众邦银行、招商银行、浙商银行、上饶银行、中关村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宜宾市商业银行、华瑞银行、百信银行、广发银行、厦门银行、厦门农商银行、海口农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恒丰银行、厦门国际银行、海口联合农商银行、包商银行。

香港机构港股投顾业务备案启动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9月19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关于为提供港股投资顾问服务的香港机构开展备案的通知》称,拟于近日为提供港股投资顾问服务的香港机构开展基本信息备案。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监管正式开闸,允许香港机构来内地做港股投资顾问,内地投资者有望享受更多“原汁原味”的港股投资服务。

国资国企

深化国企改革 河南已完成“僵尸企业”处置 1109 户

从近日召开的河南省深化国企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获悉,河南目前已完成“僵尸企业”处置 1109 户,实现大头落地。2016 年 6 月,河南省成立深化国企改革领导小组,下设清产核资、重整重组、富余人员安置、债务化解等 7 个工作组。2017 年 9 月,河南提出处置千家“僵尸企业”的国企改革“总攻战”。根据最新统计,目前,河南全省已实际完成“僵尸企业”处置 1109 户,超预期实现大头落地目标。

河南省提出,力争通过 3 年国企改革攻坚,使企业真正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独立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实现优化国有资本布局、规范国有资本运作、确保国有资本增值的改革目标。

热门企业

蚂蚁金服再投 10 亿做大小程序

在 9 月 20 日召开的金融科技开放峰会上,蚂蚁金服董事长兼 CEO 井贤栋宣布,蚂蚁金服将成立 STS(Shoulder To Shoulder)支付宝科技创新基金,3 年内投入 10 亿元,支持包括小程序在内的技术创新发展,并为小程序开发者和合作伙伴提供多项资源支持。与此同时,蚂蚁还将开启区块链开放计划。

阿里获杭州市首张无人驾驶路测牌照

在“机器革命人工智能峰会”上,杭州市政府向阿里巴巴颁发了杭州首张无人驾驶路测牌照,达摩院人工智能实验室首席科学家王刚代表阿里“无人车”团队,接过了这张车牌号为“浙 A4390 试”的牌照。这是继此前阿里方面连续曝光无人车、车路协同技术方案后,在自动驾驶方面的最新进展。

投资聚焦

中登:新修订业务指南不涉及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投资范围调整

9月20日,中登公司公告称,根据相关规定,我对《特殊机构及产品证券账户业务指南》进行了修订,并于2018年9月19日对外发布,以方便业务操作。新修订业务指南明确了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可以作为委托人开立基金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专户、证券公司定向资管计划专用账户等证券账户。此外,新修订业务指南还统一了各类资管产品开户时提交的证券账户自律管理承诺书,明确“开立的资管产品证券账户仅用于参与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许可的投资范围,资金投向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各类资管产品包括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投资范围由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规定。新修订业务指南不涉及各类资管产品包括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投资范围的调整。

余额宝平均收益连续跌破3%

9月20日,天弘余额宝每万元收益为0.7803元,七日年化收益率2.9440%,这已经是连续四天跌破3%,也是2016年以来的首次。分析师认为,进入下半年后货币政策适度偏松,短端利率下行,造成货币基金收益率出现下滑。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后市下行空间不大,并且在中秋、国庆假期或银行季末、年末考核等资金较紧的关口,货基收益率可望出现脉冲式上涨。

[返回首页](#)

地方创新

地方专项债发行“快马加鞭”一个半月发行超 6000 亿元

地方专项债发行正以井喷之势加速推进。据统计,截至 9 月中旬,9 月新增专项债发行已超 2000 亿元,加上 8 月单月发行的新增专项债 4280 亿元,仅一个半月合计发行已超 6000 亿元。从公开数据来看,今年前 8 个月全国共发行新增专项债超过 5000 亿元。为了维持财政支出规模有所扩大,2018 年新安排地方专项债券 1.35 万亿元,这也意味着剩下的月份待发行的余额约为 8000 亿元。

1-8 月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

9 月 20 日从安徽省经信委获悉,今年 1-8 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较 1-7 月提高 0.1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2.5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7、中部第 2 位。8 月份,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5.1%,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 14.2%,全省电子信息行业同比增长 32.1%,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21.2%,当月生产微型计算机 189.5 万台,同比增长 32.8%。

合肥居民可通过手机进行城乡居民医保缴费

合肥医保官方网站和微信平台医保缴费功能将于 9 月 20 日开通。合肥医保门户网站和合肥医保微信公众号的正式上线,是创新“互联网+医保服务”重要措施之一,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合肥医保”利用信息化手段再造健康服务流程,与支付宝和微信联合打造合肥医保在线移动支付平台,实现一键完成挂号和诊间费用医保支付。居民在家就可了解医保政策、完成参保缴费。

深度分析

波澜壮阔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

文/姜建清 (CF40 学术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

文章来源: CF40 微信公众号 2018 年 9 月 20 日

2018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从 1979 年开始,在邓小平“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指引下,中国的金融体系,包括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国有银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取得了巨大的变化和成就。

2017 年 7 月,全球银行业权威杂志英国《银行家》公布了 2017 年全球银行 1000 强榜单,中国共有 126 家银行上榜,较 2016 年新增 7 家。按一级资本排名的前十大银行中,中国的银行和美国的银行各占四席。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以 2812.62 亿美元的“一级资本”连续第五年位居榜首,利润、市值和资产也居榜首。将时针拨回 20 世纪,谁又能想到中国的银行业从“技术上破产”,通过改革转型发展,成功跻身全球银行业的前列。40 年来,尤其是股份制改革的近 20 年来,国有银行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实现了凤凰涅槃,完全可以载入世界金融史册。

股改是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辉煌序章,也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之战”和“一场输不起的改革”

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起步于 1979 年。波澜壮阔的中国经济改革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大背景和大基础。40 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我国金融改革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整个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三次重大的转折。

第一次转折是金融与财政的分离,改变了以往“大财政、小银行”的模式,国有银行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改革发展融资的主渠道,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逐渐建立并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与金融改革的推进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前夕,我国经济十分困难,甚至处于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发展经济首先面对的难题是“钱从哪里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中国仿照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生产由国家计划决定,投资由财政拨款解决,形成了所谓“大财政、小银行”的体制。改革开放初期,放权让利、分灶吃饭使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压抑的创造力释放出来,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

长。但随着各种“放权”“让利”举措的实施，财政收入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下滑，由1978年的31.1%减少到1980年的25.5%，1985年的22.2%，1990年的15.7%。随着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下降，居民分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上升。1978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为33.9%、11.1%和55.0%，1990年，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变为21.5%、9.1%和69.4%。居民储蓄存款随之大幅度上升，城乡储蓄存款余额由1978年的201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7034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占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存款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到1990年的51%。财政资金供给能力的减少使原来依赖财政投资的模式不可持续，所留下来的空缺，就需要转向银行融资等途径。动员、引导储蓄向投资转化，建立有效的银行融资机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项。

由于财政的资金供应能力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的迫切要求，银行的作用凸显，逐渐替代了财政的地位。原来由财政负责安排的对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拨款，在1982年比1978年减少了64.5%，1979—1982年，工商企业增加了700多亿元流动资金，其中有82%是由银行贷款供应的，只有18%是财政拨款增加的。自1979年银行开办了第一笔技改贷款后，1979年银行正式确立了技改贷款的信贷计划与资金规模，此后逐步介入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和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从1981年起，国家重新调整了宏观的投融资体制和管理制度，实行了“拨改贷”改革。1983年，又改革了企业流动资金管理制度，把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由原来的财政、银行两家管理，改为由中国人民银行一家管理。银行改革成为金融改革的起点，农、中、建三大国家专业银行相继从计划经济下“大一统”的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体系中破茧而出。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单独成立，承担原来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一个“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以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真正的银行”的组织体系在改革中逐渐形成。此后，国家专业银行迅速成长壮大，十几年间资产和营业网点十倍、百倍地增长，充分发挥了聚集、动员社会资金和撬动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形成了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动员模式和社会金融通渠道，成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生产资金的主要提供者，担负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职责，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金融与财政的分离,使银行的筹融资等功能得以恢复和强化,保证了中国改革转轨时期社会资金链和资本链的延续,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血液,成为中国改革发展奇迹得以实现的重要支撑。中国的 GDP 从 1978 年的 3624 亿元增加到 1990 年的 1.89 万亿元,至 2016 年达到 74.36 万亿元,增长了 204 倍;财政收入从 1978 年的 1132 亿元增加到 1990 年的 2937 亿元,至 2016 年达到 15.96 万亿元,增长了 139 倍。银行存款从 1978 年的 1155 亿元,增加到 1990 年的 1.39 万亿元,至 2016 年达到 150.59 万亿元,增长了 1302 倍;各项贷款从 1978 年的 1890 亿元,增加到 1990 年的 1.75 万亿元,至 2016 年达到 106.6 万亿元,增长了 563 倍。

可以说,没有金融的快速发展,没有银行信贷的快速发展,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但金融是双刃剑,在中国金融承担着经济发展重任的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40 年来中国的金融也多次遇到重大风险,所幸通过艰难的改革,涉险过关。

第二次转折是市场化、法制化改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不断进步。这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破解国企和银行经营“软约束”、实现金融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社会主义银行业的发展规律是逐步认识和深化的,国家不断发挥银行的杠杆作用,扩大货币投放和信贷规模,推动经济增长:初期银行业也通过增设机构、放权让利、扩大业务范围和改革资金管理,来搞活金融、搞活经济。但是“微观搞活”和“宏观稳定”是一对矛盾。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1978—1990 年),信贷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20.38%,经济增长率达到 14.6%。信贷的过度投放,虽然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导致市场流通的货币过多。通货膨胀根本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当然在中国还有结构失衡的原因。

1992 年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但由于经济体制中深层次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过热现象又一次出现。国家力图通过国有银行控制信贷规模,但各种拆借市场和中心、信托公司、信用社和基金会的账外的违规经营,又成为最早的影子银行。国家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治理整顿金融秩序、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的过快增长,从 1994 年开始相继实施了财税、金融、外汇外贸、计划、投资、流通体制和国有企业等领域的大力改革;实行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房地产业分业经营,银行与各种自办经济实体脱钩;成立了三大政策性银行,初步分离了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规范金融行为的《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贷

款通则》相继出台。1996年,国民经济扭转了高通胀局面,物价涨幅回落到较低水平,顺利实现“软着陆”,且在此之后保持了20多年通货膨胀较低水平的宏观金融环境。

从金融发挥融资主渠道、实施“拨改贷”和“银行统管流动资金”后,银行贷款替代财政资金,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国家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增强国有企业预算约束,通过还本付息强化企业算账意识,抑制投资冲动。但原来期冀的改变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拨款“软约束”并没有如愿实现,国有银行无力实现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硬约束”,相反成了国家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双重软约束”。财政提供资金的压力最终变成商业银行的贷款数量压力和资产质量压力。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加速转型,外部经济环境急剧变化。虽然《商业银行法》颁布后,国有商业银行的企业性质第一次得到了法律上的确立,但是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国有银行仍然无法摆脱政府行政性配置资金的体制惯性。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深入,银行承接了大量转制成本,积淀、演变并最终体现为银行的不良贷款。加上商业银行内控管理和信用文化的严重缺陷,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包袱日益沉重。据统计,到1996年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0.4%,其中预期贷款占11.4%,呆滞贷款占7.7%,呆账贷款占1.3%。五年间不良贷款增加了近4倍。当时还没有采用严格标准的国际会计准则,实际的不良贷款数额更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央更加重视金融风险。三年来治理、整顿金融秩序暴露出来的银行坏账堆积、财务亏损、经营财政化、风险不能自担等问题,使党中央和国务院对银行风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97年底中央召开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国家着手重点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之后主要采取了四大措施:一是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二是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彻底搞清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底数;三是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1999年和2000年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1.4万亿元(1999年中央财政收入仅1.14万亿元),走出化解国有银行风险的重大一步;四是成立金融党工委,建立国有银行系统党委,屏蔽地方政府对国有银行的不当干预。这为之后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做了思想和基础准备。

第三次重大转折是以产权为核心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使中国大型银行涅槃重生,翻开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新篇章。

1999年第一次剥离国有银行不良资产1.4万亿元后,四家银行的不良贷款存量仍然居高不下。2002年底,按照“一逾两呆”分类为1.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1.4%;

按照五级分类为 2.07 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 26.12%(工行为 26.01%、农行为 36.65%、中行为 25.56%、建行为 15.28%)。资本金缺口巨大,四家国有银行资本金总额 7494.38 亿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 4.27%。同时银行内控管理依然不足、信贷结构失衡、风险控制薄弱,基层机构有章不循、违规操作现象依然突出,普遍没有建立和落实对分支机构内控制度的检查和评价制度。

2001 年中国“入世”,市场开放后各界对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前景普遍担忧,银行体制改革滞后问题引起关注。中央在 2002 年召开了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决心要在“入世”过渡期结束前,彻底解决国有银行的问题。这时中央形成共识,要想让国有银行在剥离不良贷款的同时真正做到自担风险,必须从改变产权制度入手。正是在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家确定了国有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实现市场化的路径。第二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金融体制改革提速。理顺产权关系、推动政企分开、强化管理改革被列为三大目标,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降低不良资产被列为三大任务。同时决定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将金融监管改革作为金融改革任务的重中之重。这次会议后,大型银行股份制方向确定,改革大幕拉开。

大型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攻坚战”

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路径选择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并没有现成的模式、案例可以仿效。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商业银行的渐进改革一直没有停步,如采取完善法律法规、剥离政策性银行业务、消除地方政府干预、理顺金融财政关系、新设银行引入竞争机制等外部改革措施,进行商业化改革、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完善财务约束、改革人事制度、剥离不良资产、注入资本等内部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国有银行逐步走上市场化、商业化道路。然而银行“软约束”的经营体制尚未真正实现市场化转换,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也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国有银行改革的效果仍不乐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的争议类同,国有银行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科学管理不够,而是存在更为本质的体制机制问题。要引领国有银行朝着市场化、现代化的方向走得更远、更踏实,还需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改革。20 世纪 90 年代,国有企业先行进行的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功,开辟了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新路,也增强了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信心。2002 年,时任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克服种种困难,经过两年多的艰巨努力,终于使中银香港成功重组上市,为国有银行股改上市蹚出了一条新路,对

如何处理不良资产、弥补资本缺口、引进战略投资者、估值定价及治理和管理体系再造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002年国有商业银行综合化改革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研究重点在于探讨和解决可能影响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和长远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包括股份制改革、法人治理结构、解决历史包袱、动态资本金补充、加强内部管理、劳动人事分配制度和外部环境配套。

2002年,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同志牵头组织撰写并向国务院报送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综合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通过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完善国有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其中,方案最核心、也最具有争议的问题是如何处置四大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在1997年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实际资金没有到位),1999年又剥离了银行1.4万亿元(含国家开发银行的1000亿元)不良贷款后,不到三年时间这份综合改革方案提出要再剥离不良贷款9700亿元,加上消化账面非信贷损失约4700亿元,合计需要1.44万亿元。如何解决改革成本是个难题。当时,由于中央财政紧张等种种原因,再走财政拨付改革资金、承担改革成本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2001年国家财政收入仅1.89万亿元,中央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已经捉襟见肘。刨除必要的开支后,还有财政赤字2517亿元,如何能承担如此巨额的银行业改制成本?况且后来的改革实践证明,这个改革方案对改革成本的计算远远不足。在改革方案酝酿过程中,也有人提出国有银行自身逐步消化不良资产和损失,估计消化周期需10年甚至20年,这与改革所处环境和改革目的不适应。有人提出再用1999年和2000年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发债以剥离不良贷款的方法,但涉及巨额特别国债的发行,要列入财政预算、扩大财政赤字,可能性不大。巨大的改制成本使首套方案最终搁浅。

史无前例的中国特色国有银行股改方案

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十六大在总结十五大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略。其中,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依然是重中之重。十六大报告指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除肯定股份制改革的方向外,更强调了股份制改革的必要性。十六大精神既坚定了国有银行推行以股份制改造为核心的综合改革的信心,也增强了国有银行加快实施股份制改革的紧迫感。

2003 年 5 月,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带队向国务院汇报了第二次的改革构想和实施方案。与 2002 年央行提出的综合改革方案相比, 新的实施方案重点为争议的焦点问题, 即处理不良资产和增补资本金的钱从何而来的问题, 要找到全新的解决途径。其中, 不良资产是最大的金融风险, 对不良资产包袱沉重的国有银行实施财务重组, 将涉及重大资源运用, 并将决定中央银行今后五年的工作及政策走向。如果主要大型金融机构都“带病经营”的话, 将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灵, 从而影响金融功能的发挥和稳定, 进而影响经济改革成效和经济增长。因此, 国有银行改革, 不仅仅是某几个银行自身的事情, 还需要国家层面给予充分和必要的投入。针对可以动用的国家资源, 包括财政资源、国有资产资源、央行资产负债表资源和外汇储备资源, 方案创造性地提出用外汇储备解决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资源的问题。当时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渠道相对较窄, 利用国家外汇储备为国有银行注资, 既可拓宽外汇储备的投资渠道, 又有利于使所有者多元化。2003 年 12 月 16 日, 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分别向中行和建行注资 225 亿美元。关于不良资产剥离处置问题, 1999 年首次剥离时是按账面价值将不良贷款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 因而是一次政策性剥离。新的改革方案中提高了不良资产处置的市场化程度, 以拍卖方式定价销售给资产管理公司, 相对应的中央银行再贷款也能收回来。这是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央行资产负债表救助国有银行的首个成功案例。

除了财务重组模式的创新之外, 公司治理改革是这次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另一大特点。这次改革是要建立一个规范的股份制公司治理结构, 重在机制转换, 涉及股份公司治理架构、内控机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审慎会计准则、中介机构作用等多个方面, 是一次更为全面和彻底的改革。通过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 进一步改善股权结构, 真正接受市场的监督和检验, 是这次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深化和升华。

2003 年 12 月, 国家对中、建两行进行了注资, 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的帷幕正式拉开。立足各自股份制改造的不同特色, 在国家外汇注资等系列政策支持下, 通过财务结构重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公开发行上市等先后几个阶段, 四大国有银行相继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 开始了改革发展的新阶段。同时, 交通银行在深化股份制改革道路上实现了新跨越。2005 年 6 月, 交通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 2007 年 5 月在境内 A 股上市。2005 年 10 月, 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 2006 年成功回归 A 股市场。2006 年 6 月和 7 月, 中国银行也先后在香港 H 股

和境内 A 股成功上市。2006 年 10 月, 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在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同时上市的第一家金融企业, 创全球有史以来 IPO (首次公开募股) 最大规模。2010 年 7 月, 农业银行先后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 再创全球 IPO 规模之最, 至此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画上了圆满句号。

当时, 我作为工商银行改革的亲历者和操盘者, 感触颇深。工商银行经营规模大、不良资产压力重, 并没有进入改革的第一梯队。但如果不能抓住机遇进行改革的话, 工商银行将会错过机会, 在新一轮竞争发展中非常被动。为了少花钱, 甚至不花钱, 工商银行在财务重组和改制中进行了创新。工商银行获得了汇金公司 150 亿美元的注资, 并保留了财政部的 1240 亿元资本金。将损失类资产 2460 亿元出售给财政部, 财政部通过分期付款方式进行购买, 会计处理上表现为工商银行对财政部的债权(应收款); 债务偿还的制度安排是双方共同建立“特别共管基金”账户, 将财政部持有工商银行股份的分红、工商银行每年上缴所得税以及不良资产处置回收的现金等, 专项用于偿还财政部对工商银行的债务款项。结果, 不到五年时间就偿还了全部 2460 亿元的债务。“特别共管基金”账户的设立, 既减少了工商银行重组改制的成本, 又促进了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顺利实施, 实际上是利用国家信誉和财政能力, 为国有银行深化综合改革、推进股份制改造赢得宝贵的时间。同时, 这也为其他国有银行的财务重组与股份制改造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

股改后的大型商业银行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发展道路, 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家和社会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回望过去 40 年国有银行的艰辛改革历程, 股份制改革是国有银行在荆棘与磨砺中蹚出的一条道路, 可能也是最合理的选择。但时至今日, 对于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认识仍不完全一致, 甚至不时出现国有银行股改“贱卖论”的论调, 我们这代经历者和见证者更有责任和使命把这段历史说清楚。

对于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是否成功的判断, 应该建立在历史比较、动态和全局化的分析基础上。简单估算, 对比股改前的两次剥离和汇金注资等财务投入数据, 以及股改上市后到 2017 年末所创造的净利润、为国家上缴的所得税和营业税等利税总额作为财务贡献, 尚未包括股改过渡期内通过利润消化的历史包袱, 工、农、中、建四行的财务贡献是财务投入的 2.66 倍, 已经远远超过当时的财政投入。除了商业银行直接创造的财务效益外, 包括不良资产核销和处置在内的一系列措施, 更是“一把钥匙开两

把锁”，大大推动了国有企业卸重负、去杠杆和处理大量“僵尸企业”。国有银行股改建立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重塑了国家与国有银行的关系，巩固了大型商业银行在支持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主力军地位，夯实了大型商业银行的经济造血功能和金融体系稳定器的职能，为中国之后几年成功抵御金融危机、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通过股改上市，国有银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实现了从质量洼地到质量高地的转变，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股改前的20%左右下降至2017年的1.56%，拨备覆盖率从不到30%提升至171.5%，资产质量状况极大改观，风险管理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实现从行政约束到资本约束的转变，资本成为约束大型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新载体和新工具。2005—2017年，五家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净额从1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增长了7倍多；同期风险加权资产规模仅增长5.1倍，资本充足率从11.2%提升至14.6%。资本约束让大型商业银行走上了一条高效集约、收益风险平衡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从规模导向到盈利导向的转变，2005—2017年，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年创利规模从1226亿元增长至9800亿元，增长了7倍，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8.7%，创造了盈利增长的“黄金十年”；2005年以来，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累积分红超过2.4万亿元，占同期累积实现净利润总额的29.8%，为国家和其他广大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实现了从单极支撑到多元驱动的转变，2005—2017年，五家大型商业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业务收入年均增速达到22.7%，高于同期净利息收入增速9.8个百分点，占比由7.9%左右提升至18%以上；实现了从本土经营到全球拓展的转变，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在境外共计建立了1200多家机构，基本构建起覆盖六大洲和全球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境外网络布局，境外盈利贡献总体提高。同时，大型商业银行对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支持力度也明显提升，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共建立了160多家分支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搭建起通畅的金融桥梁；实现了从仰望对手到全球领跑的转变。至2017年末，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利润总量超越同期花旗集团、汇丰控股、美国银行、摩根大通、三菱日联、法国农业信贷、富国银行七家行利润规模的总和，工商银行更是连续数年蝉联全球最赚钱的银行。

同时，国有银行股改锤炼锻造出一大批专业的商业银行家，为国内国际金融改革提供了一套成功的范例。中央汇金公司先后对光大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三家保险类机构、银河证券等七家证券类机构进行了改革与重组，使一大批国有金融机构完成了市场化改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有银行的改制，没有走苏联、东欧等国

家大规模私有化、外资化的道路，而是在坚持国家控股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为国际提供了银行转制和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国有银行改革需要持续完善公司治理和推动战略转型

重温国有银行股改历史，我们能够从中总结提炼出一些经验和规律，对于指导未来中国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推动和英明决策是保障金融改革成功的基本前提，也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金融改革必须与经济发展趋势相配套，“入世”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黄金期，为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和治理结构的市场化造营造了宽松而有利的宏观环境。创新是驱动金融改革的根本动力，也是破除发展瓶颈、顺利推进改革的手段，需要进行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方法手段创新。国有银行40年的改革历史就是一部创新史。金融改革必须抓好市场化机制构建这个核心，在完成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的改革三部曲的同时，国有银行将精力集中于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致力于风险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内控机制的完善，使股改后大型商业银行实现了优良的经营业绩。改革“操盘手”和实践者的担当务实是决定金融改革落地成效的关键要素，一代代金融从业者为国有银行股改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与艰辛的努力，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股改上市并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终点，它只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新起点。股份制改革不可能解决大型商业银行面对的所有内外部矛盾，其本身也需要不断深化。同时我们处于全球经济金融急速变化的时代，面对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周期、行业周期、科技周期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大型商业银行还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改革任重而道远。大型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需要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独特道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充分发挥“三会一层”公司治理架构作用；要处理好市场化薪酬机制与党管干部原则之间的关系，完善激励机制，有效激发正能量。深入研究统筹支持实体经济与推动金融创新的关系，坚持实体经济本源，规划和推进创新，把握好创新的质与度，增强大型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坚定不移抓好风险管理，强化和创新风险管理的理念、制度、方法与工具，及时识别和化解各种风险，保持资产质量稳定，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成为稳定中国金融行业的“定海神针”。稳步推进国际化、综合化、信息化改革，贯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中国经济和企业“走出



去”的需要,深入推进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统筹应用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顺应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化趋势,稳步推进综合化经营,统筹好服务客户和控住风险的关系,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发挥好大行担当与行业规范的作用;顺应互联网信息革命的大潮,深入推进数据化银行建设,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与模式,提升服务效率和管理效率,加大金融科技创新力度和控制好金融科技风险。这些既是对股改以来大型商业银行转型三大任务的延续与推进,又是大型商业银行在新时期、新起点向更高层次目标转型改革的时代要求。

[返回首页](#)

免责声明

《金融信息采编》是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金融研究所推出的新闻综合类型的非盈利报告。内容以全球财经信息、国内财经要闻、行业热点聚焦和地方金融动态为主，并结合对信息的简要评述，发出“兴泰控股”的见解和声音，以打造有“地方金融”的新闻刊物为主要特色，旨在服务于地方金融发展的需要，为集团公司、各子公司和相关专业人士提供参考。

《金融信息采编》基于公开渠道和专业数据库资料搜集整理而成，但金融研究所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金融信息采编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兴泰控股集团金融研究所不对使用《金融信息采编》及其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负任何责任。

《金融信息采编》所列观点解释权归金融研究所所有。未经金融研究所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引用或转载。